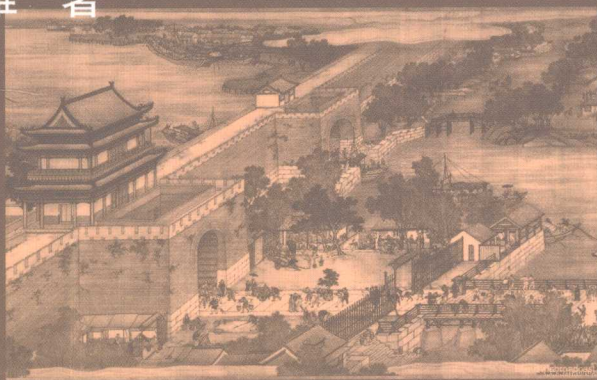


十至十三世纪

中国史学发展史

施建雄 著



陕西师范大学“二期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之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施建雄，男，福建永春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学发展途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王鸣盛学术研究》，并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南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政治学》等全文转载。

ISBN 978-7-01-0085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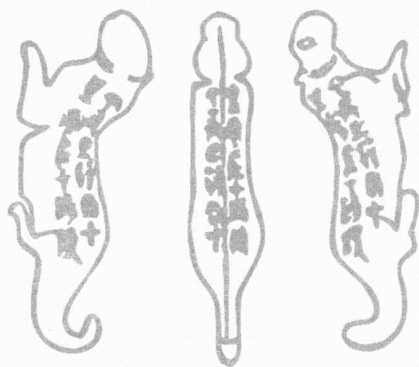


9 787010 085494 >

定价：25.00元

施建雄 著

十至十三世纪 中国史学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 / 施建雄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1-008549-4

I. 十… II. 施… III. 史学史-中国-10 世纪~13 世纪

IV.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010 号

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

SHIZHISHISANSHIJI ZHONGGUOSHIXUE FAZHANSHI

作 者: 施建雄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徐 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549-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 论	(1)
一	(1)
二	(4)
三	(6)

上篇 官修史书制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章 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9)
一 承前启后的五代史馆修史活动	(10)
二 两宋官修史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5)
三 元代官修史书的演变	(31)
第二章 史学领域的百花齐放	(42)
一 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格局	(43)
二 编年体史书的修撰	(60)
三 丰富多彩的历史著述	(71)

中篇 历史编纂的推进与历史观的演变

第三章 历史编纂的推进	(102)
-------------------	-------

一	各部史书体例运用的得失	(103)
二	史表的功能及时代特点	(151)
三	主要史书体裁“第三极”的形成	(165)
第四章	正统论对史家思想的冲击与回应	(182)
一	前期“正统论”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	(183)
二	后期“正统论”与历史发展实际相背离的理论思维	(188)
三	“正统论”的时代特点	(194)

下篇 文化认同在史学领域里的建树

第五章	《辽史》的编纂特点与历史文化认同	(203)
一	契丹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记录	(204)
二	民族交融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文化认同的生动写照	(212)
三	编纂思想的丰富与编纂技巧的灵活运用	(224)
第六章	《金史》的时代特点与编纂成就	(236)
一	《金史》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交融的历史特点	(236)
二	文化认同的历史内涵	(249)
三	《金史》的编纂成就	(268)
后 记		(288)

绪 论

—

历史编纂的发展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要总结五代宋元时期历史编纂学的成就,就必须从时代环境入手来探讨其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史学家对于社会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史为鉴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致力于历史撰述的思想基础。宋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面对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现实,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通过历史研究,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法,他们对史学经世致用的鉴戒功能有着深刻的期望;而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历代兴亡之总结,激起统治者的深刻反思,同时从历史中获取立政施教的经验。这里既有史家忧患意识的影响,更有时代情势的激发;既有文化的深沉积淀,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触。这个时期在史学领域中形成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以道德为

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无不凸显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由此促成一大批蕴涵这种意识的历史著述的诞生。欧阳修著唐史、修五代史,总结历史兴亡,正是从解决北宋社会危机的角度出发,因而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和鉴戒意识。将史学经世致用的鉴戒功能推向新阶段,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典型,当推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详尽记述了一系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实,企图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为封建帝王寻找治乱兴衰的根源,充分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鉴戒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的骤变使史家的忧患意识更加浓烈,他们矢志著书,不仅为存信史,更重要的在警时人。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学者倾注心血对本朝史进行研究,《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等当代史著述由此诞生。宋元之际,一些史学家为总结历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资借鉴,在“会通天下之理”的基础上,追求历史变化所以然之故,并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故有《通志》、《资治通鉴音注》、《文献通考》等作品的涌现。元代是中华民族重新组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元代史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以民族平等的思想为基础,总结“行汉法”的历史经验,又从民族重新组合的实际出发,对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更全面的总结,从而使元代历史编纂学的向前发展潜藏着另一股强劲的动力。元代撰修前朝史的工程还体现统治者考宋辽金三朝兴亡得失之故的旨趣,尤其在元末,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统治阶级更加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挽救统治危机,客观上却起到了将中国古代的鉴戒史学向前推进的作用。

就学术思想而论,宋代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过去史迹的记载,而要赋予历史事实以新的涵义,以史明道,以儒经之旨为依归,这在两宋时已成为史学家普遍接受的信条。儒经特别是《春秋》经对宋元史学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注重凡例、褒贬笔削和属辞比事,一是强调为史应体现儒家思想的指导原则。欧阳修编《新唐书》、撰《新五代史》就相当重视伦理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同时贯彻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在体例上凸显褒贬善恶的旨趣。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更是“褒贬去取,一准《春秋》”。元代史家在对历史人事作出价值判断时,在追究历史兴亡盛衰的根本原因时,也都浸透着理学道德至上的思想观念,《辽史》、《金史》、《宋史》的纂修者们同样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正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特别是宋代以后,不少思想家和史学家都曾围绕着历史上一些王朝的历史地位,用各自的“正统观”加以评价和论述,因而对人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编纂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它是由五德相胜说衍生出的嫡系相承、王者受命、春秋笔法、褒汉贬胡等一系列编写史书的原则。既然“正统论”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就必须重视它的来龙去脉及思想内涵,包括它的理论体系和历史哲学的具体构成,后期“正统论”与历史发展实际相背离的理论思维,同时还要重视“正统论”中涉及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阐明“正统论”的时代特点及其政治影响。两宋史学在历史观念方面,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其中欧阳修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无神论思想的优良传统,摒弃阴阳图讖和怪异之说,在其所撰的《新五代史》中取消《五行志》而立《司天考》,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中罕言鬼神怪异,郑樵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之说为“欺天之学”,将神意史观“灾祥说”解释的历史还原为人类自身的历史,马端临改五行为“物异”,把体现神的“灾异”

说成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完全与人事无关。这些认识,在史学发展的进程中都彰显出它的进步性。

二

史馆修史制度的运作、发展和与此相应的史书编纂经验的积累以及官修史书所取得的硕果,是五代宋元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旧唐书》的修撰,代表着五代时期在官修史书及史馆制度的运作方面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宋代史馆制度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形成一套极为完善的修史机构,包括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编修敕令所、玉牒所等,也形成官修国史的规范程序,即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旧五代史》和《新唐书》的修撰是史馆修史的代表性成果。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形成一套因人设局、自辟官属及以书局自随的范式;此外,在酝酿选题、指导编修、探讨学术、斟酌文辞、删削定稿等方面以及同编辑同人的通力合作上,都富有成效,为集体修史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辽和金代设史官,起居注、实录的修撰几乎没有停顿过,金代曾两度修撰《辽史》,这是对中原文化系统中修史制度效法的具体体现。元代从蒙古汗国时期起,就用蒙古文修“脱必赤颜”即《元朝秘史》。元朝建立后,还从前朝继承了依累朝实录修国史的优良传统,官修典章制度史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代表性的有《元典章》、《通制条格》和《经世大典》等。此外,元还承前制设史馆修宋、辽、金三史,由此构成纪传体正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凡此都体现官修史书制度在保持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和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就历史编纂学而论,宋代的历史编纂不仅数量繁富,而且形式

多样,显示出兴盛的局面。其特点是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变革中有创新。既有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承袭和完善,还有编年体史书的突破与飞跃,更有新的史书体裁的问世与传播。《旧唐书》的修撰反映出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新唐书》在取舍、组织史料和表述方面各具特色,体例上创新居多,尤其是一些类传和志、表的设置,反映出历史编纂的进步。《旧五代史》纪传皆首尾完具,《新五代史》意主断制,义例谨严,二书繁简,各有所长,后者还是传统史学中私修正史的代表作之一。《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在体例上灵活多变,叙事多样,兼采众体裁之所长;采考异法鉴别史料,并采用了不别正闰、借年纪事的纪年法;在编写步骤上,作丛目、修长编、再删定成书。司马光所撰《考异》,主要说明史料的异同及去取的原则,其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例。其他如司马光所编的《通鉴举要历》及《历年图》、《百官表》、《稽古录》等,无一不与《通鉴》有关。自从《资治通鉴》问世之后,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才得以重振旗鼓,复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在《通鉴》的直接影响下,仿制、改编之作,不断出现。紧跟《通鉴》之后,刘恕即作《通鉴外纪》,其后金履祥撰《通鉴前编》。注释《通鉴》之作也不断涌现,其中功力最深、能与《通鉴》并存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胡三省의《通鉴音注》。《资治通鉴》一书在历史编纂学上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不仅如此,明代王宗沐、薛应旂各有续《通鉴》之书,至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修《续资治通鉴》。此外,由《通鉴》派生而出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又各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出现了新史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体。除此之外,在历史编纂中较有影响的就是《通志》的撰

著。《通志》以“会通”为指导思想,一则体现在总体结构上即表述形式上,再就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其“纪传”删录诸史,大抵沿袭以往史书所设之目,但一些类传的设置反映了作者对客观历史的某些独到见解。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加之对史表功能的相关论述及对通史著述的强调,反映出郑樵历史编纂理论的丰富内涵。郑樵平生精力在《通志》。《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所无,体现唐代以来史家对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认识的新水平,作者在综合、损益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历史编纂主要是记述典章制度的藩篱,开拓了有关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撰述的新途径。

三

十至十三世纪是我国历史上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必然会对两宋史学家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产生深刻的影响。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中的“攘夷”思想就较为浓厚,尤其体现在《四夷附录》一目之中。司马光同样忧虑北宋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资治通鉴》中对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极为重视。他在许多地方谴责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侵扰内地的非正义战争,但他也反对汉族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发动的侵夺战争,同时主张交邻以信,强调对四周邻国和少数民族守信义尤为重要。司马光还能够比较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十二世纪初,女真崛起于松辽,灭辽侵宋,占有中原,而赵宋王朝则偏安江左,这样的政治格局自然引起宋儒文化心态与历史观念的深刻变化,从华夷之辨的角度来论正统归属之风相当盛行,阐发此义深且有影响

者当推朱熹,其撰《资治通鉴纲目》贯穿这种思想于始终,一方面在研究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编纂特点时,剖析两宋史家及其著述所受民族意识的濡染,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十世纪以来,北方的契丹、女真及蒙古等族先后与汉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开创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其中文化传统的交流融汇尤为重要。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不约而同地推崇儒家学说,契丹、女真统治者亦很注意学习汉唐的历史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原文化中重视修史的传统,组织编写了部分官修史书,由此促进了历史编纂学的向前发展。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元王朝政治统治的历史,同时也重视宋、辽、金三朝的历史,最终确定三史各自为书、各系其年号的基本编纂形式,既显示了政治上的博大胸怀,也表明经过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反映在史学上就是史学之民族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得到不断的加强。其中《辽史》撰述在辽代已有的耶律俨本、金代陈大任本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编纂技巧,创造性地使用各种体例,尤其是志和表,将其功能作了有效的发挥,既反映出辽代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又将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形象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因客观地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复杂的民族交往与斗争,故在中国史学史上树立了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通过对《辽史》记载旨趣的分析,包括它对契丹社会历史进程的生动反映,民族交融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历史、文化认同的多方面展现等,不仅有助于全面评价《辽史》本身的学术地位以及它和中国古代史学其他著述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有利于正确认识史学传统在促进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金史》是元代修撰的另一部重要史书,它在编纂上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表现为叙述的精练、记事的准确和编次的恰当,同时在编纂上还有所创新,因而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而且它本身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交融的历史特点以及所彰显的文化认同,对于全面认识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正确把握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篇 官修史书制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章

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史馆修史制度的运作、发展和与此相应的史书编纂经验的积累以及官修史书所取得的硕果,是五代宋元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旧唐书》的修撰,代表着五代时期在官修史书及史馆制度的运作方面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宋代史馆制度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形成一套极为完善的修史机构,包括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编修敕令所、玉牒所等,也形成官修国史的规范程序,即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旧五代史》和《新唐书》的修撰是史馆修史的代表性成果。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形成一套因人设局、自辟官属及以书局自随的范式;此外,在酝酿选题、指导编修、探讨学术、斟酌文辞、删削定稿等方面以及同编辑同人的通力合作上,都富有成效,为集体修史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辽和金代设史官,起居注、实录的修撰几乎没有停顿过,金代曾两度修撰《辽史》,这是对中原文化系统中修史制度效法的具体体现。元代从蒙古汗国时期起,就用蒙古文修“脱必赤颜”即《元朝秘史》。元朝建立后,还从

前朝继承了依累朝实录修国史的优良传统,官修典章制度史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代表性的有《元典章》、《通制条格》和《经世大典》等。此外,元还承前制设史馆修宋、辽、金三史,由此构成纪传体正史中不可缺少的篇章。凡此都体现官修史书制度在保持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和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承前启后的五代史馆修史活动

自班固著《汉书》以后,断代体史书盛行,而每代之末,必修前代之史,开局设监之制由是而兴,整齐记注之法也由此而定。¹即便是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定的时代,对史书的修撰也同样非常重视。清代史家王鸣盛曾感叹道:“观《旧唐》昭、哀两纪,极乱之世,纪录犹详赡乃尔。”²五代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史学史上,它上承唐代,下启宋元,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其修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前后相承,连续不断。具体包括以下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

首先,对历史编纂重要性的认识如出一辙,由此推动史书修撰的前后相续。五代时的人们往往认为,治学专究经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滞,而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极谈王霸,经纬治乱,非史不可”。³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后梁末帝贞明中(921)就令大臣李琪与张衮、郗殷象、冯锡嘉等修撰《太祖实录》三十卷,后因其“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又诏宰臣敬翔别纂《大梁编遗》三十卷,与实录偕行。后唐从立国之始,对实录及国史的修撰就倍加重视,值得大书特书。后唐明宗先于天成二年(927)诏告天下,“国祚中兴已逾五载,皇基统嗣爰及两朝,其有纪年之书、行事之纪,未闻编录,实谓旷遗。所司既不举明,史馆又无起请,因循斯久,阙漏转多。

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庄宗两朝实录，速具奏呈。新朝日历行事亦可精专纂录，无使废坠者”。⁴ 至天成四年由史官张昭远等修成后唐《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及《庄宗实录》，命名系采纳监修国史赵凤的意见，后者认为“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太祖已上并目为纪年录”，⁵ 说明当时的史官对实录体史书的体裁、体例、断限的认识非常明确。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还曾两次纂修功臣列传，三年，史官张昭远等详考记注，按编年旧体，撰成《后唐明宗实录》。后晋时纂修《旧唐书》更是一代佳话，这将在相关章节中专门加以介绍。

后汉时也有修史的举措。不仅于乾祐二年（949）二月敕令宰臣苏逢吉监修，贾纬、王仲同修《高祖实录》，而且采纳窦贞固的建议修前朝实录，窦氏以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神功圣德，靡不详明。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莫究端由。伏穹睿慈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⁶ 说明对修撰前朝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七月终于由窦贞固献上《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和《少帝实录》二十卷，世宗显德三年（956）底，又下诏修后周太祖实录及后梁均王、后唐清泰帝两朝实录。对此，张昭远曾予以深刻的阐发，“撰《汉书》者先为项传，编《蜀记》者首序刘璋，所贵神器之传授有因，历数之推迁得序。伏缘汉隐帝君临在太祖之前，其历试之绩，并在汉隐帝朝内，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君位，未有记录，请依《宋书》刘劭例书为元凶友珪，其末主请依古义书为梁废帝，其书曰后梁实录。唐末主之前有应顺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编纪，请书为前废帝，清泰主为后废帝，其书并为实录”。⁷ 此项内容表明当时的史学